



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时代使命： 霍巍教授访谈录

◆ 霍 巍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 马伯垚

◆ 金弘翔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采访

◆ 吕宁晨

◆ 王 煜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校对

◆ 金弘翔

霍巍,1957年生,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学术兼职有: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日本文部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吉林大学中国边疆考古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客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等。2011年被教育部聘为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2013年被国家社科规划办聘为国家社科基金评委,2015年受聘为第七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并任考古学召集人之一。

霍巍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考古学的教学与研究,在业内享有广泛声誉。主要研究领域为汉唐考古、西南考古、西藏考古、文物学与艺术史、中外文化交流、博物馆学。先后在国内权威学术期刊《考古学报》《历史研究》《民族研究》《考古》《文物》《世界宗教研究》《中国藏学》以及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东方学报》等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西藏西部佛教文明》《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南的对外文化交流》《西南考古与中华文明》《考古发现与西藏文明史第一卷:史前时代》《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青藏高原考古研究》《皮央·东嘎遗址考古报告》等多部学术著作。

访问者(以下简称“访”):霍老师您好!很荣幸有机会向您采访。我们知道,您自从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考古系以来,已经在考古学界耕耘了四十余年,取得了很多成绩,尤其是在历史时期考古的领域,创获颇丰。而这四十年,中国考古学也发展得十分迅速,重大发现目不暇接,各项研究也都有所突破。那么在您看来,历史时期考古研究在这四十年间发展的如何?它目前在中国考古学的体系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霍巍教授(以下简称“霍”):谢谢!我想先谈谈

今天我要说的“历史时期考古”。中国考古学是一个整体,但实际上它可以分成三个大段。第一个阶段是史前考古,研究的对象是几乎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时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石器时代考古;第二个阶段是原史考古,这个时期已经有了一些文字记载,但数量很少,内容也很模糊。因此这一段历史的研究,还非常依赖考古材料,考古学本体发挥的价值很大。原史考古在我们中国,就是常说的三代考古。如果把这两段划开,中国考古学第三个大段,就是进入战国秦汉以后的考古学研究。从战国秦汉开

始,我们中国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文献记载,这与前两个大段落是很不一样的。我今天要谈的历史时期考古,主要说的就是这第三个阶段。

大家都知道,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而我是在1978年有幸考入四川大学,学习中国考古学的。在我学习期间及毕业以后,我感觉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考古学,有了很大的进步与提升。各个时段的考古新发现都层出不穷,而且不断有重大发现。但是我始终感觉,我们的历史时期考古,尽管在资料积累层面比过去要迅猛得多,但是对于中国文明起源、发展以及特征这些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还是跟史前考古领域有一定差距。改革开放以来,在史前考古这个时期,随着一系列重要考古遗址的发掘,考古学家们重新拼缀出一幅中国史前时期文明发展的线条、框架与版图,而这个版图,是过去仅靠文字记载所不能建构的。因此史前考古的成就与贡献,确实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

而在历史时期考古,我们每个年度也都有一些能够反映不同文明阶段特点的重大考古发现,但是非常遗憾,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并没有帮助我们建立大的框架、体系方面,建立起像史前考古那样的文明体系。我们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以文献史料为基本框架,考古材料仅仅是起到印证、补充作用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跟中国考古学整体的发展水平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也就是说,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增多,中国考古学的前段和后段,对中国文明研究的贡献有一种不对称性,这是我长久以来观察到的一个现象。



图一 1986年与李永宪教授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合影

访:我们想知道,这种“不对称性”的出现,背后可能有哪些原因呢?

霍: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这个现象的背后说明了什么,那就是我们对历史时期考古的关注,目前还很不足。表面上看,大家都承认中国考古学有这三大段,但实际上,由于各个段落特点不一样,大家往往将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关注点放在前两段上,所谓“古不考三代以下”的观念还根深蒂固。甚至有人认为,既然历史时期有了丰富的文献记载,那考古学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呢。近年来也是这样,新技术的运用、新理论的提出,基本上也都是围绕着前两段展开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起源工程,也都是围绕着前两段展开的。

因此,比较起来,第三个大段的关注度远不如前两段那么高。而且似乎很难把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能够一以贯之、恰如其分地运用到第三个大段的研究中。类型学、地层学似乎主要在前两个大段的研究中发挥比较大的作用。那么在后段,主要的理论和方法应该是什么呢?又如何正确运用我们类型学、地层学的基本手段呢?这些问题讨论得比较少,导致从事历史时期考古的相当一部分研究者以及他们所指导的学生,缺乏对历史时期考古在方法、理论层面的思考,只能机械地套用前两个时间段所采用的方法。已经有明确纪年,或者可以通过跟纪年材料相比较而准确断代的考古材料,还要用类型学的断代手段。有一些科技考古的技术,运用得也不到位,不知道在历史时期考古中怎么样去发挥科技手段的价值。

正是有这些现象存在,导致我们历史时期考古,在一些大的问题上没有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感。所以如果我们要把中国考古学作为一个整体、一个体系来加以看待,很显然,历史时期考古是我们的弱项,应该予以加强。

访:您刚才说,我们的历史时期考古,这四十年在大的问题上没有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那在历史时期考古领域,究竟有哪些重要的大问题是我们应该予以重点关注,并发挥考古学自身价值的呢?

霍: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研究对象,是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考古遗存。较之史前时代,要丰富很多。具体而言,一个是物质生活的进步,带来了人们

衣食住行整个社会条件的改变；第二个是精神层面的进步，其一表现在国家、社会的形成，各项制度的完备；其二是人们的精神信仰世界更加丰富，产生了不同的宗教，从过去原始的自然崇拜向宗教信仰层面发展，比方道教，那是到了汉代以后才形成的。还有一些来自境外的宗教，是不同的历史时期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中土的，这些都体现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因此，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的角度，的确与史前考古不太一样。如果说史前时期，我们考古学关注的是人类社会的初级发展，那到了历史时期，我们就要关注文明相对高级的阶段，人类从物质到精神层面的进步。刚才我已经谈到了几个方面，这些都应该是历史时期考古可以施展身手的广阔空间。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谈早期社会，似乎材料和话语都很多。但是真正进入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存在如此丰富的考古遗存和文献记载，我们的话语反而显得比较单调，也比较平庸。这是中国考古学目前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

实际上历史时期考古的前辈学者，已经在两条主线上努力地做出了贡献。其中之一是中国古代文明、古代社会在起源之后，是如何发展、兴盛的，其过程中又有哪些特征。尤其反映在上层领域，一些制度是怎么形成的。比如都城、陵墓，这些都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特征在考古学中的反映。因此以往我们历史时期考古，聚落研究做得比较少，主要考虑的是帝陵以及各地不同等级的墓葬所反映出的等级制度。

这方面的工作，前辈学者只是开了一个头，我们没有一步步地去深化。举例来说，对于中国古代墓葬制度的发展问题，俞伟超先生提出了三段，即“周制、汉制、晋制”。俞先生只是提出了一个纲要，我们必须去接着思考这个问题，接着思考这样的阶段性变化。这个变化不完全与朝代更迭相对应，而是有自己独自的脉络，运用考古材料去构建这样的时空框架，这个工作才刚刚开头。

除了这条主线以外，还有一条线是中外文化的交流，中国文明与域外文明的互动。比如宗教考古，对佛教、景教到基督教这一类宗教考古遗存的关注和梳理，很大程度上都涉及中外文明的交流。这也是我们如今应该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

在我们的学术史中，以往有过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完全否定中国文明的独立发展，即“中国文明

西来说”。另一个极端，则是完全否认中国文明与域外文明的交流，生怕被扣上“西来说”的帽子。这两种倾向都是不正常的。而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已经可以正大光明地探讨中国文明与域外文明的交流，以及中西文化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宿白先生就曾经对若干带有域外文明因素的考古现象入手，讨论了从商代就开始有的中西文明交流问题。这个比丝绸之路在时代上更早，早在殷商时期的青铜文化中，就已经有了欧亚草原文明的一些因素。到了汉代，这种中西交流就更加丰富了，既有技术体系上的，也有思想观念上的。所以我认为在这条线路上，这四十年以来，相比起改革开放以前确实有进展。到了今天，那更应该有一大批新的优秀成果涌现。



图二 1997年在西藏阿里地区
开展田野调查(右二)

另外，还要补充一点。对于所谓“四裔”，即周边地区的考古研究，也是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这方面，在文献中往往充斥着族群的误解与偏见，考古材料的价值不言自明。比如对吐蕃的研究，无论是靠汉文还是藏文的记载，都很难把许多问题说清楚，正是近些年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建构起了我们对吐蕃时代的历史认识。

访：您刚才总结了历史时期考古的两大主线，也谈到前辈学者在这两条线上都有贡献。谈第一条主线时，您提到前辈学者已经开了头，但我们却没能继续深化。那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改变这种现状？

霍：要做出改变，首先应该明白我们的不足，其中之一就是对文献的利用能力。我们今天新一代，甚至中生代的学者，应该讲，跟老一辈学者相比，对古代文献的利用能力还有一定差距。所以，我们还不能够非常娴熟地把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融为一体，很好地去阐释历史时期这些考古发现的价值。

实际上，要宏观地去考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各地所形成的地域文化等等大的方面，背后都有很多文献记载可以利用。我们在这些层面，往往不能够把地下发掘出的材料，跟文献记载中的宏观历史关怀，紧密地结合起来，融为一体。

所以我们看到，历史时期考古的论著，比较常见的还是两张皮，前面是对考古材料的梳理，但是这种梳理最后却并不能透物见人，看不到大的制度性变化留下的痕迹。这方面最值得学习的例子，还是刚才提过的俞伟超先生对“周制、汉制、晋制”的总结，他提出了中国古代墓葬制度有所谓阶段性的变化，这就是在充分熟悉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很好的宏观关照。我们非常希望能将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捏合成整体，去看大的制度变化的关键点，进而形成由考古材料自身构建出的时空框架，为中国文明的历史提供另一种观察维度。

此外，如今历史时期考古开展的工作缺乏系统性，还基本处在个案研究比较多的状态，将这些个案放到体系下加以考察的工作做得还不够。所以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缺乏一个宏观理论的指导，目标不够明确。很明显，我们中国考古学在史前考古中，就是要搞清中国文明起源的路径、主要的样态以及特征。但是到了历史时期考古中，我们就没有这样一个大的宏观目标，来指导我们开展研究。近些年来才有学者注意到，比如关于中国的“中”，就是文化的结晶，“中”“和”的观念在考古材料中都有反映，比如历代的宫城及其宫门、道路的设置，都是某种制度、理念的反映。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不是说没做，但是总得来说还没有形成体系。

访：对于您指出的这两点不足，我们当然应该努力地去弥补自身的差距。但是我们也想知道，可能存在哪些因素限制了自己？

霍：影响因素当然有很多，在这里我只强调一点，那就是学术史上的重要影响。中国的历史时期考古，应该说本来有着非常悠久的传统，因为从秦汉以来，我们实际上就已经有了非西方系统的考古学元素，我们把它叫做“金石学”。我很同意把中国的金石学视为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前身，它当然不是今天现代意义上的史前考古学的前身，但可以称作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前身。在那个时代，恰恰和后来“古不考三代以下”的理念相反，金石学家往往是

不看史前时期的，而是从三代开始往后看。尤其以“金”和“石”两个大类为主体，“金”就是我们讲的青铜器，“石”就是包括汉魏以后的石刻、造像、碑志等等。这种古典主义传统，早在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前，就已经有方法论上的特点：第一，充分运用文字材料，高度重视那些有纪年、有铭刻的实物资料，进行解读，而且把它们放置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第二，将实物材料本身和文献中的记载，紧密地结合起来。

这个情况，实际上和西方考古学形成的过程是很类似的。西方考古学最初也有自己的古典主义传统，他们首先关注的就是有铭刻、有文字的材料。像埃及学、亚述学的形成，都是从解读器物上的古代铭刻开始，而这些铭刻的载体，很多都是考古的资料，这些就是西方考古学的古典主义来源。他们之后才发现，仅仅靠这个是不够的，这种办法对于古典文明的研究有用，但是无法解决西方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以及一些文字缺乏的所谓“蛮族”。研究这部分历史，那只能靠考古材料的质地和样式变化来进行分期排年，形成了后来“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三期说。

所以西方考古学同样是个整体，传入中国以后，我们注意得比较多的是其非古典主义传统的部分，就是我们讲的由三期说发展起来的类型学、地层学，而忽略了它也有古典主义的传统。强调了一部分，忽略了一部分。不过实际上，在西方考古学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也不完全是这种情况。殷墟的发掘与研究，就是一个结合体，当时方兴未艾的考古学界，并没有排斥中国古典主义的传统，而是与西方传来的现代考古学相融合。我们可以看到，殷墟考古一方面重视西方的地层学、类型学这样的田野考古理论，但是也充分关注到出土的甲骨文材料，及其与《史记·殷本纪》记载之间的联系，这就是很



图三 在“大唐天竺使出铭”碑前留影

好的一个结合。

但是越往后,我们反而对中国古典主义的传统,或者说对金石学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太尊重前辈留下来的遗产。在史前考古的工作中,我们倾注了很多力量。但是在历史时期考古这部分,关于其前身,关于金石学和历史时期考古学之间的线索,这条学术上的脉络在逐渐地被淡化。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其影响非常深远。直到现在,我们讲到科学的考古学科,往往都是以史前时代作为“科学考古学”的典型与样板。而历史时期考古学,往往很难上升到这个层面和高度。这就是因为我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忽略了在中国考古学体系中,古老却又独一无二的特征,或者叫传统。

访:您可否仔细谈谈,中国考古学体系中这种古老却又特别的传统,主要的内涵是什么?我们在历史时期考古的实际研究中,又应当如何围绕着这种特征或传统来展开研究呢?

霍:这种特征和传统主要就是中国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汉字体系,从甲骨文、金文发展到汉代的隶书,再到以后不同的字体。实际上这个源头应该追溯得更广泛一点,秦统一以前,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字体系,比如秦国的石鼓文,楚国的鸟虫书,但它们也都还在一个大的体系之中。秦统一之后,文字在全国的统一实在功莫大焉,我们形成了非常完备的汉字体系,这个是中国文明非常重要的标志,有别于西方各大文明。其他文明并没有一以贯之的文字体系和文献体系,而只在我们中国有。所以在拥有这个体系的基础上,今天我们以中国古史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学,应当同样重视对这些文字体系、文献记载体系的梳理。

最近我看到冯时教授写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他提出的一个观点,我非常同意。他讲到,要全面看待中国的文字体系。产生于中原地区的甲骨文、金文文字,成为我们文字体系的核心和主干,但是也不能忽略其他地域中,那些很可能与甲骨文、金文同期,甚至更早一点——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的一些文字雏形。也就是说,文字体系的形成带有多样性,在书写方面有不同地域的影响。当然,不同地域的文字,同样一个字形,是不是表达同样的意思、读音还有待甄别,但至少在中国文明起源中,文字在各地的起源,以及最后形成的汉字体系,是这个文明最大的特征。这个特征可以说从史前时代

一直到历史时期,一以贯之,几千年来体系都是稳固的,这是中国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最大的特点。所以虽然中国文明有过朝代的更替,统治集团也有变化,但是这个文字和文献的体系,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化中非常坚固的一条线索。

这一点,在考古学材料上,也是得到充分反应的。那么历史时期考古也好,史前时期考古也好,我们都应该很好地把这个特征抓住,围绕着它予以行之有效的研究,这就涉及之前谈到的问题——如何去解读文字和文献的材料。这方面,我们的古人应该说做了大量的实践,留给我们的金石学著作很多都跟这个有关系。因此我们在今天的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中,尽管有了西方的类型学、地层学方法,有了西方传来的各种科技考古的技术,但最终要解决历史时期考古的问题,还是离不开文字和文献。所以,我认为在方法论上,我们中国的考古学应该有自己的特点,这个特点恰恰是在有文字以来的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中反映得最充分,不是简单地用某种科技手段可以取代的。



图四 2010年于美国哈佛大学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报告



图五 2011年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报告

要很好地利用文献解决考古问题，我们一方面要客观地看待“疑古”的观念，也就是曾经由“古史辨派”提出的观点。不可否认，这一理念中有合理的成分，但其针对的现象主要还是集中在上古时期。秦汉以后尽管也有文献作伪，也有古史辨派所警惕的一些文献存在，但总体来讲，历史时期考古可以使用的文献十分丰富，可以参互比较，进而可以相对容易地甄别伪书或是过于片面的记载，这和上古时期完全不一样。因此，要解决历史时期考古的若干问题，我们就必须高度重视丰富的文献材料，并加以利用。

另一方面，我们更要反对“考古学只是证经补史，是历史学的附庸”这种认识。重视文献价值的同时，绝不能忘了考古材料自身蕴涵的特殊价值与意义，所以我们的解决问题之道就是“整合”二者，而不是简单地补充或对应。我在这里用了“整合”这个词，所谓整合，应该是各取所长，各自发挥长处。文献记载可以给我们一个宏观的、整体的，比较有序列性的历史叙事，但是往往没有细节；而考古材料可以从细节上见微知著，以小见大，发现很多文献材料所不能提供的信息。

访：您说了一个概念叫“整合”，那究竟该从哪些角度入手，将历史时期考古出土的材料和丰富的文献记载整合起来呢？

霍：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例如张勋燎先生提出的道教考古。道教尽管有《道藏》，有大量的道书文献，但过去的情况是，研究道教者不用考古材料；研究宗教考古的，往往不懂道书文献。所以这样一来，我刚才讲的整合就没有完成，各执一端，所以很多事实看不清楚。具体来说，天师道中有一套法术，是在墓葬里面利用朱书镇墓瓶为人解注，其中的细节，在考古材料中有大量的反映，而这是文献材料没有弄清楚的内容。还有像天师道形成的地域、主要流行的范围，道书文献的记载和考古出土的材料之间，是不能够两相吻合的，这就需要加以整合，将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加以相互比较，才能够对天师道的形成、影响范围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再举一个例子：早期佛教的研究。文献典籍里讲“明帝夜梦金人”，汉明帝晚上做梦梦到金人，这个金人头上有项光，是佛。事实上现在的考古材料里面，发现了许多可能和佛教有关的早期图像，这些

图像跟文献材料之间也要加以整合，我们才能对早期佛教传入中土的情况，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

我再举第三个例子：中国古代的墓祭。古有墓祭？还是古无墓祭？墓上祭祀究竟是从什么时代开始的？这个问题，文献记载中本来就有不同的意见，但是结合考古材料，我们通过研究殷商时期的墓葬，战国时期像中山王陵这样的墓葬，就可以对中国古代墓祭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形成一些新的认识。

第四个例子，是我最近正在思考的一个问题：陵前“神道”的形成。同样如此，何为“神道”？那一定是通“神”之道。神道本身的形成，那一定和人们的灵魂观念联系在一起。但是中国从春秋战国以来，文献典籍里对灵魂的描述，就有着地理上的区别。北方的鲁地、中原，南方的楚地、巴蜀，对于灵魂的态度就是不一样的。对灵魂态度的不一样，会直接影响到墓葬的营设，也直接影响到神道的设置。

这些问题都是事关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的大问题，在这些层面上，其实我们有相当大的空间，但是我们现在做得不够好。这些题目过去曾被认为不是考古学的题目，我认为这是非常滑稽的。那什么才是考古学的题目呢。难道只有分型分式才是考古学的题目吗？因此，我一直主张，考古学是一个整体，考古学的方法论不是排他的，考古学的方法论是以解决问题作为最终目标的，中国历史时期要解决什么问题，就决定了历史时期考古可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其中对文字和文献的高度重视，把对文字与文献的诠释，运用到考古材料的解读当中，就是主要的方法之一。这个方法不能被忽略，而我们常常强调的史前时期的研究方法，未必会适用于历史时期，这是很明显的。

所以我认为，上述的林林总总，都是目前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我们要去思考，同时反复地进行实践。解决好了，我们才能够真正把四十多年来，甚至更长时段内积累的大量考古材料，加以系统地梳理和研究，进而说明中国文明的发展与兴盛，以及进入高级阶段后反映出的若干问题。只有做到这一点，历史时期考古才能和史前考古并驾齐驱，为中国考古学做出贡献。

目前坦率地说，我认为历史时期考古，还远远不能跟史前考古做出的贡献想比拟，就在于我们有这么多思想上的禁锢、理论和方法上的停滞不前。在研究视野上局狭，没有很好地实现整合。所以也就

没有很好地利用考古材料去解读中国文明的历程，更没有把中国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做一种横向的比较。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两条主线，一个是我们自身体系内的，对中国文明从起源、初期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过程中的若干观察和思考；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体系跟其他文明体系之间发生的交流，刚才我也谈了，技术层面、思想精神层面实际上都有交流。但这两条线，在如今的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中，都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合理的框架，这两条时空关系，我们没有用考古材料很好地和文献材料加以整合。这里我要强调一点，考古材料的变化未必和文献记载中的朝代更替同步，往往要滞后，所以不能完全跟王朝更替的政治史去对应，应该以一个独立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体系。



图六 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内查阅文献

访：您反复强调了历史时期的独有特点，以及历史时期考古的古典主义传统。但我们知道，考古学在中国形成一门现代学科，这与当时从西方传入的理念、方法密不可分。那么今天，我们再反过来强调我们固有的古典主义传统，其意义究竟在何处？

霍：这是我要特别指出的一点，就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所具有的当代价值。因为我们的中国考古学，曾经走过一个螺旋式的道路。最早，我们对“中国文明西来说”抱有强烈的抵触，而且经过考古工作证明，中国文明确实是独立发展的，是拥有自我根性的文明体系。

但是一段时间内，我们又走进了另一面，就是言必称西方，好像一切都是西方比我们强。我刚才也说到，在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中有一种倾向，即用西方传来的现代考古学，或者叫田野考古学中的部分观念来涵盖一切。甚至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未来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进步，就是要从西方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当中，找到我们的解决问题之道，比如“后现代主义考古学”，“新考古学”，要从这里面去拿东西，来形成我们中国考古学未来的理论和方法。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有片面性的。因为西方的理论，尤其是英美的理论，包括新考古学、后现代主义考古学，往往研究的对象，都不是古典时代的，而是主要集中在史前时期，针对没有文字记载的考古现象。

所以目前在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体系中，要警惕一切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情况，应当非常客观、冷静地去看待差异，既要吸纳从西方传入的现代考古学，或者叫田野考古学的科学基因；但另一方面，还要从我们自身的古典主义传统中，继承并发扬光大我们自身独有的文化基因，这样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用以指导中国大地上的考古实践。

这个任务很艰巨，我们的前辈学者没有能够最终完成，应该说这个历史任务落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学的中生代和新生代学者肩上。所以在今天，习总书记提出了“文化自信”，具体到考古学研究当中，我们文化自信在哪里？就在于中国考古学整体体系的形成之中，一定也有传统文化留下的精粹之处。糟粕当然要排除，但是精要之处应该努力地加以继承和发扬，这也是我们中国历史时期考古一个时代上的命题。

访：宿白、俞伟超先生都曾提出，要谨记考古学是历史学科的一部分，您今天在这一问题上也谈了很多。不过，我们观察到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一些历史时期考古的研究，讨论到最后，仅仅只是为了证明历史学已有的结论，或者干脆把历史学已有的结论照搬过来，用以解释发现的考古现象。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如何避免？

霍：这个问题也就是西方学界曾经批评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主义倾向”或叫“历史主义偏见”。我刚才也谈到，我们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实物材料，实物材料和文献记载之间，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对应关系。所谓“证经补史”，过去不少人对于历史时期考古，往往就有这样的看法。在我看来，我们很多考古学的研究，首先要用实物材料，来形成考古学自身的叙事体系。这一点就有别于文献材料，或许我们观察的只是一个片段，只是大历史过程当中的一个小过程。但这凸显的就是我们考古学的特色，否



图七 2017年在历史考古青年沙龙(成都)上发表主题演讲



图八 2018年指导研究生在阿里东嘎墓地进行发掘



图九 2018年于皮央东嘎石窟进行田野调查
则就成了纯粹的文献研究。不过,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又不能完全地切开,你做的研究和历史记载毫无关联度,也会让我们生疑。因此我反复强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整合。

所谓整合就是考古学的观察要有历史背景,请

注意,只是背景,不能完全用历史书写来取代,只是考古材料与历史背景相互照应。这样观察的侧重点,和一般的文本叙事会有所差异。这样的例子在考古学研究中很多,刚才我也举过一些。如果仅仅只是简单地套用文献研究中已有的结论,简单地借用一些历史记载当中的观点,给考古材料套上一个帽子,那不是我们的考古学,恰恰丧失了考古学应该具有的学科属性和学科特点。究竟怎么去做,还需要我们从事考古学研究、受过考古学训练的学者认真地进行思考和实践如何和文献材料建立整合关系,而不是简单地套用某个模式。

举例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家大族,确实是魏晋政治的一个特征。但是当我们运用考古材料进行研究时,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着眼点?我们可以通过对世家大族墓葬的排列、墓室的营建、随葬品的陈设等各个方面来观察,这些世家大族在丧葬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是如何选择和行动的,进而形成我们的一套表述。这个表述或许跟大历史背景之间,有相互应和之处,但很可能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历史记载所没有涉及的,甚至有差异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坚持基于实物研究所得出的叙事。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而不能简单地贴标签,戴帽子,那不是历史时期考古的方法。

历史时期考古还是考古学,当然,广义上讲,考古学还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但是考古学有自身的属性,研究的对象是实物。实物形态是有质地、色泽、制作过程、类型变化等等若干可以观察到的特征,这些完全可以跟历史叙述之间形成一个整合关系,有分有合,凸显考古学研究的学科属性和特点。

访:前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英国考古学家希安·琼斯的理论著作《族属的考古》,他们的微信公众号向读者提了一个问题:“你认为,多少年后,中国将有自己的族属考古理论?”我看到,大部分读者都选择了10年或20年,甚至还有不少人选择了50年。我想,这一情况或多或少也反映了我们中国考古学目前的一些状况,那就是理论建设的相对薄弱。您刚才也谈到了历史时期考古缺乏宏观理论的总结和指导,那您认为究竟该如何做,才能推动我们自身理论的形成?

霍:历史时期考古的理论和方法是两个概念。方法是多元的,所有的方法都可以用。但是什么叫理论?理论是经过若干个案研究以后,发现的具有指



图一〇 2018年与李永宪教授再次合影

导意义的一种方法论层面的提升和总结。但是目前这个阶段,就以你说的族属为例,在方法论上,解决族属考古问题的手段就很单调和欠缺。所以没有若干方法的尝试,我们很难在若干方法的比对当中,找到具有规律性和指导意义的内容,也就无法对若干方法进行总结、归纳和提升,以形成理论。

例如区系类型,现在看来完全可以称之为一个理论。在一开始,苏秉琦先生就是用区系类型的办法,解决古部族,或者叫人群的问题。但通过这种区系类型的研究可以发现,各地确实存在不同的群团性。居住在巴蜀的人,有自己的群团性,居住在荆楚的人,也有自己特点的群团性。那么这个区系类型的方法,在考古学的若干实践中证明可行,就上升成一个区系类型的体系,这就形成一个理论了。像族属这一问题,目前首先在方法论上还比较欠缺,所以短时间内就更难谈到理论的形成。要形成历史时期考古的理论,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只有在具体问题中探索了多种维度的方法之后,才能比较好地总结、归纳出理论,进而再来指导具体问题的研究。

访:您曾在川大主办的历史考古青年沙龙中讲了“考古学的‘守戒’与‘破界’”,这对我们今天谈到的历史时期考古研究有哪些启示?

霍:考古学毕竟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先不谈理论,从方法上讲,考古学从获取材料到解读材料,都有自己独特的手段。基本的地层学、类型学方法,在

历史时期考古中同样能发挥自身的价值。谁叠压了谁,谁打破了谁,都能很好地说明问题。比如在乐山麻浩崖墓中发现的佛像,之所以我们能够确定是东汉的遗物,晚不到三国时期,就是因为两座墓葬之间形成了打破关系,这座发现佛像的墓葬被另一座东汉晚期的墓打破了。所以说在历史时期考古中,类型学、地层学这样的基本方法还要继续运用。

而破界是讲什么呢?这个意思是说我们不要把自己牢牢地绑缚在类型学、地层学这两个方法上。对于史前考古来讲,确实器物的排列是重要的断代方式。但是在历史时期考古的研究中,有时一个墓碑,一块墓志就可以解决时代问题。甚至没有墓碑墓志,出土一个五铢钱也很能说明问题。

破界还有一个重要层面,就是在我们跟其他学科之间。我们要看看其他学科在考虑什么样的问题。例如艺术史的研究,同样用墓葬的考古材料,但是艺术史学者就会考虑到墓葬当中那些今天已经看不到、但是当时一定有过的礼仪程序:从迎丧、下葬、闭圻,到最后的祭奠。像这样的视角,我觉得就是考古学应该学习的地方。要破就应该破这样的“界”,使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

历史学就更不必说了,历史学提出的若干重大问题,我们都要去思考对比,和我们的考古材料之间有多大的关联度,在历史学者提出的某些重大命题的背景当中,有没有考古学的痕迹。如果有,是什么样的情况,是与那些重大命题互相呼应呢,还是完全两码事。比如说“唐宋变革论”,在日本学者最早提出来以后,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理论。但是在考古学上,有没有所谓“唐宋变革”,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我们要说明这个变革确实有,就要想想文献梳理出的发起地域、发起方式、发起的阶段性以及整个流程,在考古材料构建起的框架中能否看到。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至少应该予以关注。所以历史时期考古,因为面对的社会确实更加复杂,材料也更加丰富,我们就一定要破画地为牢之界,才能充分发挥考古学自身的作用,形成自己的书写与表达。

霍巍论著目录

论 文

1987 年

《宋元明墓葬的尸体防腐技术》，《四川大学学报》1987 年第 4 期。

《从丧葬礼俗看先秦两汉时期两种不同的形神观念》（与黄伟合著），《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 37 辑），1987 年 6 月。

1988 年

《论四川宋墓中的几种道教石刻》，《四川文物》1988 年第 3 期。

1989 年

《西藏灵塔与肉身之制初探》，《西藏研究》1989 年第 2 期。

《试论无胡蜀式戈的几个问题》（与黄伟合著），《考古》1989 年第 3 期。

《论成都羊子山晋墓出土的铅人与玉猪》，《成都文物》1989 年第 4 期。

《印度 Maharagha 遗址出土的古稻》，《南亚研究季刊》1989 年第 3 期。

《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与古代西亚文明》，见《四川文物·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1989 年。

1990 年

《论宋元明时期尸体防腐技术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四川大学学报》1990 年第 1 期。

《宋元时期的敦煌葬俗》，《敦煌研究》1990 年第 1 期。

《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的原始文化》（与李永宪合著），《西藏研究》1990 年第 2 期。

《喜马拉雅山南麓和澜沧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村落》，《农业考古》1990 年第 2 期。

《我国史前时期的人体装饰品》（与李永宪合著），《考

古》1990 年第 3 期。

《藏南吉隆崖葬习俗的调查与初步研究》（与李永宪合著），《南方民族考古》第 3 辑，1990 年。

《西藏天葬风俗起源辨析》，《民族研究》1990 年第 5 期。

1991 年

《论江西明代藩王墓葬的形制演变》，《东南文化》1991 年第 1 期。

《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的原始文化》，《西藏研究》1991 年第 3 期。

《西藏考古新发现及其意义》，《四川大学学报》1991 年第 2 期。

《西藏昂仁古墓葬的调查发掘与吐蕃时期丧葬习俗研究——兼论敦煌古藏文写卷 P·T1042 考释的几个问题》，《南方民族考古》（第 4 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 年。

《西藏昂仁县古墓葬的调查与试掘》（合著），《南方民族考古》（第 4 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 年。

《西藏昂仁日吾其寺调查报告》（合著），《南方民族考古》（第 4 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 年。

《西藏吉隆罗垄沟石器地点》（合著），《南方民族考古》（第 4 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 年。

1992 年

《评欧美“新考古学派”——兼论我国史前考古传统模式的变革》，《四川文物》1992 年第 1 期。

《关于琮、璧的两点刍议》（与李永宪合著），《考古与文物》1992 年第 1 期。

1993 年

《论卡若遗址经济文化类型的发展演变》，《中国藏学》1993 年第 3 期。

《西藏考古新收获与远古川藏间的联系》，《三星堆与

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

《吉隆贡塘王城及卓玛拉康遗址的调查与阿里贡塘王国若干问题的初步研究》（与李永宪合著），《藏学研究论丛》，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西藏山南拉加里宫殿勘察报告》（合著），《文物》1993年第2期。

1994年

《试论吐蕃王陵》，《西藏考古》第1辑，1994年。

《西藏高原远古丧葬习俗的古史传说之历史考察》，《西藏研究》1994年第1期。

《西藏高原远古葬俗的考古新发现》，《中国西藏》1994年第2期。

《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民族研究动态》1994年第2期。

《〈大唐天竺使出铭〉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日]《东方学报》第66册1994年3月。

《吐蕃时代墓葬的动物殉祭习俗》，《西藏研究》1994年第4期。

《西藏高原史前葬俗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藏学》1994年第4期。

《〈大唐天竺使出铭〉摩崖石碑的考古发现》，《中国藏学》1994年第4期。

《阿里夏达错湖滨旧石器的发现》，《中国西藏》1994年第6期。

《西藏曲贡村石室墓出土的带柄铜镜及其相关问题的初探》，《考古》1994年第7期。

《西藏高原墓葬考古的新发现与藏族族源研究》，见《中国西南古代的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

《西藏仲巴县城北石器地点》（合著），《考古》1994年第7期。

《西藏山南隆子县石棺葬的调查与清理》（合著），《考古》1994年第7期。

《西藏吉隆县发现唐显庆三年〈大唐天竺使出铭〉》（与李永宪合著），《考古》1994年第7期。

1995年

《西藏高原古代墓葬的初步研究》，《文物》1995年第1期。

《试析考古发现的西藏佛教摩崖造像》，《西藏艺术研究》1995年第2期。

《从考古材料看吐蕃与中亚、南亚的古代交通》，《中国藏学》1995年第4期。

《从新出考古材料论“吐蕃”的源流》，《四川文物》1995年第4期。

《略论吐蕃时期墓葬的器物随葬制度》，见《四川藏学研究（三）》，四川民族出版社，1995年。

《西藏考古与西藏古代文明》，《西藏研究》1995年第3期。

《西藏西部皮央·东嘎石窟群佛教遗迹调查记》[日]日本茨城大学教养部专刊29号，1995年第29期。

《チベット高原に残る最古の汉文石碑》，[日]《しにか》日本大修馆书店，1995年。

1996年

《从新出唐代碑铭论“羊同”“女国”之地望》，《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

《密教遗迹与唐代的中日文化交流》，[日]《考古学季刊》54号，1996年1月。

《西藏佛教考古的新发现》，《西藏民俗》1996年第2期。

《藏传佛教密宗的铜造像》，[台湾]中华文化学会95、96年刊，1996年7月。

《考古学的资料からみた吐蕃と中央アジア及び西アアの古代の交通》（上），[日]《阪南论集》第32卷第01号，1996年6月。

《考古学的资料からみた吐蕃と中央アジア及び西アアの古代の交通》（下），[日]《阪南论集》第32卷第02号，1996年9月。

《チベット高原のピラミット》[日]《しにか》1996年第9期。

1997年

《古格与冈底斯山一带佛寺遗迹的类型及初步分析》，《中国藏学》1997年第1期。

《论古代象雄与象雄文明》，《西藏研究》1997年第3期。

《关于岷江上游牟托石棺墓几个问题的探讨》，《四川文物》1997年第5期。

《再论西藏带柄铜镜的有关问题》，《考古》1997年第11期。

《西藏阿里皮央·东嘎石窟考古调查简报》（合著），《文物》1997年第9期。

1998年

《西藏西部佛教石窟中的曼荼罗与东方曼荼罗艺术》，《中国藏学》1998年第4期。

1999年

《西藏西部佛教石窟壁画中的降魔变与西域美术的比较研究》，《西藏研究》1999年第1期。

《三段式神兽镜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 [日]《日本研究》1999年3号。

2000年

《吉隆文物古迹与蕃尼道上古代中尼文化交流的若干问题》,《西藏研究》2000年第1期。

《王玄策与蕃尼古道》,《中国西藏》2000年第2期。

《从新出考古材料论我国西南的带柄铜镜问题》,《四川文物》2000年第2期。

《近十年西藏考古的发现与研究》,《文物》2000年第3期。

《西藏东嘎石窟壁画中的佛传故事画试析》,《西藏研究》2000年第4期。

《关于佛教初传吐蕃传说的一个新版本》,《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4期。

《四川何家山崖墓出土的神兽镜及相关问题研究》,《考古》2000年第5期。

2001年

《西藏西部佛教石窟壁画中供养人像服饰的初步研究》,《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大唐天竺使出铭相关问题再探》,《中国藏学》2001年第1期。

《20世纪西藏考古的回顾与思考》,《文物》2001年第6期。

《岷江上游新出南朝石刻造像及其相关问题》,《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5期。

《西藏高原早期金器的考古发现及其相关问题》,《西藏研究》2001年第4期。

《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墓地发掘简报》(合著),《考古》2001年第6期。

《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1997年调查与发掘》(合著),《考古学报》2001年第3期。

2002年

《卫藏地区几座佛教石窟遗迹及其相关问题》,《西藏研究》2002年第3期。

《论西藏札达皮央佛寺遗址新出土的几尊早期铜佛像》,《文物》2002年第8期。

《西藏阿里札达县象泉河流域发现的两座佛教石窟》(合著),《文物》2002年第8期。

《西藏阿里东嘎佛寺殿堂遗址的考古发掘》(合著),《文物》2002年第8期。

2003年

《吐蕃第一窟——拉萨市药王山札那路浦石窟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1期。

《古格王国早期木雕艺术》,《西藏研究》2003年第2期。

《论青海都兰吐蕃墓地考古发掘的文化史意义》,《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试析汉晋神兽镜中的龙虎神兽与“衔巨”图纹》,《考古》2003年第5期。

《试析西藏东部新发现的两处早期石刻造像》,《敦煌研究》2003年第5期。

《变迁与转折:试论西藏西部帕尔嘎尔布石窟壁画考古发现的意义》,《文物》2003年第9期。

《胡人俑、有翼神兽、西王母图像的考察与汉晋时期中国西南的中外文化交流》,见《九州学林》2003年第一卷第三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

《西藏阿里札达县帕尔嘎尔布石窟遗址》(合著),《文物》2003年第9期。

《西藏阿里札达县帕尔宗遗址坛城窟的初步调查》(合著),《文物》2003年第9期

Cultural Exchange and Quest for Immortality: The Heavenly Horse of the West and the Divine Dragon, Exchange, Issue 6 February 2003.

2004年

《试论西藏及西南地区出土的双圆饼形剑首青铜短剑》,《庆祝张忠培教授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

《西藏西部石窟壁画中几种艺术风格的分析》,《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

2005年

《西藏西部早期文明的考古学探索》,《西藏研究》2005年第1期。

《唐代的胡人俑与唐代的中外文化交流》,《考古学民族学的探索与实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

《记西藏皮央遗址出土的一件织有阿拉伯文字的织物》,《文物天地》2005年第1期。

《粟特人与青海道》,《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2期。

《四川汉代神话图像中的象征意义——浅析陶摇钱树座与陶灯台》,《华夏考古》2005年第2期。

《论横断山脉地带先秦两汉时期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

《西藏西部佛教石窟壁画中的波罗艺术风格》,《考古

与文物》2005年第4期。

《西藏文物考古事业的历史性转折》，《中国藏学》2005年第3期。

《近年来大唐天竺使出铭及唐代著名使节王玄策研究述略》，《西藏研究》2005年增刊。

Newly Discovered Buddhist Cave Mural in Western Tibet and Its Significance, Chinese Archaeology, Vol 5, 2005.

New Archaeological Finds in Xianquanhe River Valley, China's Tibet, Vol.16, No.4, 2005.

2006年

《早期密教图像在敦煌的传播及其来源的新探索》，《敦煌研究》2006年第2期。

《唐王玄策携来之“摩诃菩提树像”几个问题的考释》，《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庆祝佟柱臣先生八十五华诞学术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与唐使王玄策事迹有关的日本奈良药师寺佛足迹石几个问题的补识》，《九州学林》2006年夏季四卷二期。

《流传海外的一批西藏西部早期铜造像》，《文物》2006年第7期。

《川西北高原嘉绒藏区嘎达山古寺壁画考古调查记》，《汉藏佛教艺术研究：第二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

2007年

《试论吐蕃时期原始巫术中的“天灵盖厌胜习俗”——青藏高原新出土考古材料的再解读》，《中国藏学》2007年第1期。

《西域风格与唐风染化——中古时期吐蕃与粟特人的棺板装饰传统试析》，《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1期。

《中国西南地区钱树佛像的考古发现与考察》，《考古》2007年第3期。

《于阗与藏西：新出考古材料所见两地间的古代文化交流》，《藏学学刊》（第3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

《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的初步观察与研究》，《西藏研究》2007年第2期。

《佛教艺术初传中国》，《宗教信仰与想像》，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7年。

《一批流传海外吐蕃文物的初步考察》，《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5期。

《对西藏西部新发现的两幅密教曼荼罗壁画的初步考释》，《文物》2007年第6期。

《盐源青铜器中的“一人双兽纹”青铜枝形器及其相关问题初探》，见《三星堆研究第二辑》，文物出版社，2007年。

《试论西藏西部象泉河流域新发现的几处大石遗迹》，《东亚古物》（B卷），文物出版社，2007年。

《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人物服饰的初步研究》，《艺术史研究》（第九辑），2007年。

《西藏西部石窟艺术中的曼荼罗图像研究》，《2005年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7年。

《西藏阿里札达县象泉河流域卡俄普与西林衮石窟地点的初步调查》（合著），《文物》2007年第6期。

《西藏阿里札达县象泉河流域白东波村早期佛教遗存的考古调查》（合著），《文物》2007年第6期。

Newly Discovered Grottos in Western Tibet, Amy Heller and Giacomella Orefino: Discoveries in Western Tibet and the Western Himalayas, Brill's Tibetan Studies Library, Brill, Leiden Boston, 2007.

2008年

《神兽西来——重庆忠县新发现石辟邪及其意义初探》，《长江文明》（第一辑），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8年。

《近年来西藏西部佛教石窟美术考古的发现与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十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

《认同与歧义：汉晋时期“西南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华学》（第九、十辑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西南夷”与南方丝绸之路》，《中华文华论坛》2008年12月增刊。

《四川东汉大型石兽与南方丝绸之路》，《考古》2008年第11期。

Center and Periphery: The expansion and metamorphosis of Han culture—A case study of stone carvings in No.1 Mahao cave tomb, Leshan, Sichuan Province, China,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Volume3, Number, June 2008.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and Examination of the Money Trees Picture and Buddhist Images in Southwestern China, Chinese Archaeology, Volume8, 2008.

2009年

《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1期。

《中古时期的“高原丝绸之路”——吐蕃与中亚、南亚

的交通》，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编《西域：中外文明交流的中转站》，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9年。

《吐蕃考古与吐蕃文明》，《西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敦煌莫高窟第465窟建窟史迹再探》，《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

《突厥王冠与吐蕃王冠》，《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

《襄人与羌胡》，《文物》2009年第6期。

《吐蕃马具与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考古》2009年第11期。

《成都平原史前农业考古新发现及其启示》，《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11月增刊。

《西藏列山墓地相关问题的再探讨》，《藏学学刊》（第5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

《中印边境佛教考古的新收获》，见《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甘肃民族出版社，2009年。

Gungthang Kingdom City in the Border of China and Nepal—A Series of Archaeological Trips in Gyirong County, China's Tibet, 2009.3 Vol.20.

2010年

《考古学所见西藏文明的历史轨迹》，《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

《西藏洛扎吐蕃摩崖石刻与吐蕃墓地的调查与初步研究》，《文物》2010年第7期。

《昌都卡若：西藏史前社会研究的新起点——纪念昌都卡若遗址科学发掘30周年》，《中国藏学》2010年第3期。

《汉晋时期河西与岷江上游的“羌胡”辨析》，《纪念徐中舒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巴蜀书社，2010年。

History Engraved on the Stones: Tubo Stone Inscription in Lhodrah, China's Tibet, 2010.1 Vol.21.

Mysterious Ancient Watchtowers in the deep Valley of South Tibet: An Archeological Study in Lhozhang, China's Tibet, 2010.3 Vol.21.

2011年

《唐宋墓葬出土陀罗尼经咒及其民间信仰》，《考古》2011年第5期。

《青藏高原东麓吐蕃时期佛教摩崖造像的发现与研究》，《考古学报》2011年第3期。

《关于古格王国早期佛教遗存的再探讨——兼评则武海源西部西藏佛教史·佛教文化研究》，《敦煌研

究》2011年第3期。

《西藏西部新出土古代丝织物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11年。

《中印边境佛教考古的新收获》，《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2008年度理事会暨“敦煌汉藏佛教艺术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11年。

An Investigation of Carvings in Samye Monastery, China's Tibet 2011.3 Vol.24.

Holy Beasts in Buddhist Wall Paintings in West Tibet, China's Tibet 2011.6 Vol.22.

2012年

Pre-Historic Jade Implements in Tibet and Their Transfer Westward, China's Tibet 2012.2 Vol.23.

Searching For Tobo Brocade Garments overseas, China's Tibet 2012.3 Vol.23.

Field Work on the Famous Monastery of Guge Times on the Sino-Indian Border, China's Tibet 2012.4 Vol.23.

A Study of ancient Tibetan gold and silver ware, Chinese Archaeology, 2012, Vol.12.

The Mandala Fresco: A Divine Universe Made up of Square and Circle, China's Tibet 2012.6 Vol.23.

2013年

《试论西藏高原的史前游牧经济与文化》，《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西藏早期游牧文化聚落的考古学探索》，《考古》2013年第4期。

《西藏高原史前农业的考古学探索》，《民族研究》2013年第2期。

《从考古发现看西藏史前的交通与贸易》，《中国藏学》2013年第2期。

《范式转变与路径突破：近年西藏史前史研究新趋势》，《历史研究》2013年第3期。

Ancient Rock Art at the Mouth of Trango Go, China's Tibet 2013.2 Vol.24.

Equestrian Treasures: 7th to 9th Century Gold and Silver from the Tubo Kingdom, Orientations, October, 2013, pp 89~91.

2014年

《金银器上的吐蕃宝马与骑士形象》，《西藏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曲贡遗址之性质及相关问题讨论》(与王煜合著),《中国藏学》2014年第1期。

《试论西藏发现的早期金属器和早期金属时代》,《考古学报》2014年第3期。

《四川泸县宋墓研究两题》,《江汉考古》2014年第5期。

《西藏西部的佛教石窟美术》,《理论、方法与实践:美术考古与大足学研究》,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

《论川西高原石棺葬中北方青铜文化因素的几个问题》,《无限悠悠远古情——佟柱臣先生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

2015年

《六朝陵墓装饰中瑞兽的嬗变与“晋制”的形成》,《考古》2015年第2期。

《吐蕃王朝时期的佛寺遗存与汉地文化影响》,《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论藏东吐蕃摩崖造像与吐蕃高僧益西央》,《西藏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西藏西部的早期墓葬及其与周边文化的关系》,《北方民族考古》(第2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

《荒漠清灯苦行僧——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发掘所见僧侣生活》,《历史教学》2015年第12期。

《藏东吐蕃佛教摩崖造像背景初探》,《民族研究》2015年第5期。

2016年

《西藏西部考古新发现的茶叶与茶具》,《西藏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从于阗到益州:唐宋时期毗沙门天王像的演变》,《中国藏学》2016年第1期。

《丝绸入蕃:考古学的观察及其文化史意义》,见《西北民族论丛(第十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吐蕃“告身制度”的考古学新印证》,《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科学出版社,2016年。

《考古图像中的吐蕃胡瓶》,《中国西藏》2016年第4期。

Pegasus on the Highland Silk Road, China's Tibet, 2016.2 Vol.27.

On the early metal objects and early Metal Age in Tibet, Chinese Archaeology, 2016. Vol 16.

2017年

《文物考古所见古代青海与丝绸之路》,《青海民族大

学学报》2017年第1期。

《青海玉树大日如来佛堂的考古调查与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

《唐蕃会盟与吐蕃佛教》,《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1期。

《法门寺地宫出土“随求”与舍利瘞埋制度》,《文物》2017年第2期。

《阙分幽明:再论汉代画像中的门阙与“天门”》,《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四辑),湖南美术出版社,2017年。

A Historical Monument on Heaven's Road (Part Three), China's Tibet, 2017.1 Vol.28.

Buddhist Statues Engraved on Rocks, China's Tibet, 2017.2, Vol.28.

The Giant Buddha Statue on a Cliff at the Side of the Ancient Road, China's Tibet, 2017.3, Vol.28.

2018年

《吐蕃金银器中的带翼神兽》,《中国西藏》2018年第1期。

《考察吐蕃时代社会文化“底色”的三个重要维度》,《思想战线》2018年第2期。

《松赞干布陵的古史传说与考古探索》,《历史教学》2018年第8期。

《西藏史前考古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中国藏学》2018年第2期。

《齐梁之变:成都南朝纪年造像风格与范式源流》,《考古学报》2018年第3期。

《论成都出土的早期佛像天王像》,《考古》2018年第8期。

The evolution of auspicious beasts in the burial decoration of the Six-Dynasties Period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Jin System", Chinese Archaeology 2017 Volume 17.

Gold and Silver Winged Gods From the Tubo Period, China's Tibet, 2018.1, Vol.29.

The Tomb of King Songtsen Gampo, China's Tibet, 2018.3, Vol. 29.

2019年

《考古学视野下的四川汉代移民研究——以新都东汉崖墓出土“石门关”题刻为视角》,《中华文化论坛》2019年第3期。

《近70年西藏考古的回顾与展望(1951—2019)》,《中国藏学》2019年第3期。

《中国考古学的古典主义传统及其当代意义》,《思想

战线》2019年第6期。

《青藏高原发现的古代黄金面具及其文化意义》(与霍川合著),《敦煌学辑刊》2019年第3期。

《11—14世纪的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及相关问题研究》(与韦莉果合著),《江汉考古》2019年第5期。

专 著

1989年

《文化旅游》(与高大伦合著),巴蜀书社,1989年。

1992年

《四川丧葬文化》(与黄伟合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

《世界古代奇迹》(与李连图、陈晓龙合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

1993年

《错那、隆子、加查、曲松县文物志》(合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吉隆县文物志》(合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阿里地区文物志》(合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昂仁县文物志》(合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1994年

《西藏佛教寺院壁画艺术》(合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西藏岩画艺术》(与李永宪合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1995年

《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1996年

《西藏访古录——雪域先民的足迹》,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

1997年

《西藏石窟遗迹》(与李永宪合著),[日]集英社,1997年。

1998年

《西藏西部佛教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大礼安魂——中国古代墓葬制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

1999年

《蜀与滇之间的考古学》,[日]《四川的考古与民俗》庆友社,1999年。

2001年

《西藏西部佛教艺术》(与李永宪合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

2002年

《古格王国——西藏中世纪王朝的挽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2006年

《西南天地间:中国西南的考古、民族与文化》,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6年。

2007年

《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南的对外文化交流》(与赵德云合著),巴蜀书社,2007年。

2009年

《皮央东嘎遗址考古报告》(合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

2011年

《西南考古与中华文明》,巴蜀书社,2011年。

《云阳走马岭墓地》(合著),科学出版社,2011年。

2012年

《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

2014年

《中国藏地考古》(合著),天地出版社,2014年。

《秘境探古:西藏文物考古新发现之旅》,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

2015年

《考古发现与西藏文明史·第一卷:史前时代》(与吕红亮、王煜合著),科学出版社,2015年。

2016年

《青藏高原考古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其 他

1986年

《简牍档案浅谈一》,《成都档案》1986年第3期。
《简牍档案浅谈二》,《成都档案》1986年第4期。
《光辉灿烂的古蜀文化——成都地区考古新发现》,《成都档案》1986年第4期。

1987年

《简牍档案浅谈三》,《成都档案》1987年第1期。
《战国时期的攻坚战的防御战》,《历史知识》1987年第2期。

1988年

《人类早期取火方式漫谈》,《历史大观园》1988年第2期。
《冰封雪掩之下的秘密——巴泽雷克墓群》,《历史知识》1988年第1期。
《神秘的“斯通亨奇”环状列石》,《历史知识》1988年第2期。
《世界古代遗迹奇观》,《旅游天地》1988年第5期。
《神奇的纳斯卡巨型地画》,《历史知识》1988年第6期。

1989年

《最早开发美洲大陆的先驱》,《历史大观园》1989年第3期。
《世界古代遗迹奇观》,《东西南北》1989年第3期。

1990年

《西藏先民的人体装饰品》,《雪域文化》1990年第3期。
《神秘的史前“巨石阵”》,《历史大观园》1990年第3期。

1991年

《西藏史前时期的骨器》,《雪域文化》1991年第1期。
《西藏宗教文化中鹰的形象》,《雪域文化》1991年第1期。

1992年

《昂仁古墓试掘记》,《雪域文化》1992年第2期。
《唐碑蕃道话春秋——西藏高原考古旅行之一》,《西南旅游》1992年第6期。
《西藏高原大石遗迹发现记》,《历史大观园》1992年第8期。
《阿龙沟的诱惑》,《雪域文化》1992年秋季号。

1993年

《佛教密宗艺术中的曼荼罗》,《雪域文化》1993年第2期。
《藏边古寺探奇——西藏高原考古旅游之三》,《西南旅游》1993年第3期。
《略论西藏佛教寺院壁画艺术》,《雪域文化》1993年第3期。
《中国古代的墓葬防盗》,《历史大观园》1993年第10期。

1994年

《西藏吉隆大唐天竺使出铭与历史上的王玄策出使印度》,《中国文物报》1994年7月17日。
《西藏西部发现绘有精美壁画的石窟遗迹》,《中国文物报》1994年1月3日。
《西藏吉隆县境内发现〈大唐天竺使出铭〉摩崖石碑》,《中国文物报》1994年4月10日。

1995年

《古格故城壁葬为佛教瘞窟葬考》,《中国文物报》1995年7月16日。
《西藏西部佛教考古新收获》,《中国文物报》1995年9月3日。

1996年

《中国宗教文化史研究的华章——略评〈白马寺志·龙门石窟寺〉》,《中国文物报》1996年8月25日。

1998年

《东嘎·皮央——佛教王国昔日的辉煌》,《中国西藏》1998年第2期。
《古代玛雅天文遗迹探奇》,《历史知识》1998年第3期。
《“死亡之丘”摩享佐达罗》,《历史知识》1988年第5期。

2000年

《打开荒漠中的神秘宝库》,《大自然探索》2000年第1期。
《佛教考古惊世大发现》(上),《四川青年报》2000年1月7日。
《佛教考古惊世大发现》(中),《四川青年报》2000年1月9日。
《佛教考古惊世大发现》(下),《四川青年报》2000年1月10日。

《东嘎·皮央遗址——破译西藏古文明》，《中国文物报》2000年4月30日。

《皮央·东嘎发现记》，《奥秘》2000年第10期。

《让龙谭镇走出来吧》，《民族团结》2000年第10期。

2001年

《吐蕃古墓试掘记》，《中国西部》2001年4月号。

《东方维纳斯——记四川大学博物馆藏的一尊断臂菩萨像》，《四川经济日报》200105。

2002年

《踏察神秘的象雄古城》，《中国西藏》2002年第1期。

《象雄故地上的神秘之丘》，《中国西藏》2002年第2期。

2003年

《一个被历史尘封的史前村落——阿里高原考古手记之三》，《中国西藏》2003年第2期。

《寂寞天外的绝响》，《中国西部》2003年第6期。

《走近神秘的古格王国——一位考古学家的西藏手记(一)》，《紫荆》2003年第3期。

《牧羊女孩的童话——一位考古学家的西藏手记(二)》，《紫荆》2003年第4期。

《进入古格都城札不让——一位考古学家的西藏手记(三)》，《紫荆》2003年第6期。

《古格—西藏佛教的桥头堡——一位考古学家的西藏手记(四)》，《紫荆》2003年第8期。

《古格秘宝再现——一位考古学家的西藏手记(五)》，《紫荆》2003年第11期。

《铁路穿过吐蕃墓地》，《文物天地》2003年第12期。

2004年

《亲易近人、良师益友》，《四川文物》2004年第1期。

《古格王国的覆灭(中)——一位考古学家的西藏手记(七)》，《紫荆》2004年第6期。

《古格王国的覆灭(下)——一位考古学家的西藏手记(八)》，《紫荆》2004年第9期。

《古格的来世今生》，《西部旅游》2004年第12期。

2005年

《象泉河流域的考古调查——揭开古老象雄文明之谜》，《中国西藏》2005年第1期。

《桑达石窟——遗留在悬崖上的色彩》，《西藏人文地理》2005年5月号。

《仁钦桑布大师法体之谜》，《西藏人文地理》2005年

7-8月号。

2006年

《佛光初现阳光城——探访拉萨大昭寺(1):修建在魔女心脏上的寺院》，《中国文物报》2006年3月17日第四版。

《佛光初现阳光城——探访拉萨大昭寺(2):千年神殿现奇观》，《中国文物报》2006年3月24日第四版。

《佛光初现阳光城——探访拉萨大昭寺(3):绘制在密室中的早期壁画》，《中国文物报》2006年3月31日第四版。

《中国史前考古研究探索的心路历程》，《中国文物报》2006年7月19日第四版。

《天路探古》，《中国西藏》2006年第4期。

2007年

《蕃尼古道》，《西藏人文地理》2007年第6期。

2009年

《仙女神殿卓玛拉康》，《中国西藏》2009年第5期。

《西藏西部佛教寺院类型与年代分布》，《西藏人文地理》2009年7月号，第四期。

《吐蕃王陵：一个高原王朝的背影》，《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1月26日第五版(历史学版)。

Why Dalai Lama can't represent all Tibetans, China Daily, 2009-03-27.

2010年

《拼缀历史碎片，复原远古社会——读王仁湘、张征雁〈金沙之谜——古蜀王国的文物传奇〉》，《中国文物报》2010年8月6日第8版。

2011年

《镂金刻银铸珍奇：漫话吐蕃金银器》，《中国西藏》2011年第3期。

《人间堡垒还是天神之居？》，《华夏地理》2011年7月号，总第109期。

2012年

《崖壁上的千年佛光：西藏石窟》，《西藏人文地理》2012年第3期。

《锦衣化裳起惊鸿——流传海外的吐蕃织锦衣物寻访记》，《中国西藏》2012年第4期。

《象雄都城可能在卡尔东》，《华夏地理·西藏阿里专辑》2012年第10期。

《古格银眼：来自天边的珍奇佛像》，《中国西藏》2012

年第6期。

2013年

《机遇·挑战·应对：新形势下中国考古学的走向与发展——2012年教育部社科委历史学部考古学科建设会议侧记》，《中国文物报》2013年2月1日第5版。
《中国考古学的昨天、今天与明天》，《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7月25日。
《考古勾勒出阿里文明线条》，《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8月16日。

2015年

《“王侯”丝绸与黄金面罩：阿里高原象雄考古揭秘》，《大众考古》2015年第1期。

2017年

《王尧先生与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见《笔发江山气，帐含桃李风——怀念藏学宗师王尧先生》，上海远东出版社，2017年。
《隐藏在密林中的佛教圣殿》，《中国西藏》2017年第4期。

(责任编辑：周广明)

上接 第196页

照后来公布的肢解葬数量统计，第三期中接近三分之一数量的墓葬是肢解葬，笔者认为，这较广西地区流行的屈肢葬风格迥异，至少从第二期到第三期，顶蛳山人不会无端改变固有的传统屈肢葬，除非有新的族群迁入。但他们被肢解的部位、段数并无严格的规律可言，骨头的摆放也没有规律，可谓姿态各异。可见，在此肢解葬还并未形成一种成熟的埋葬方式或称为葬俗。

而在顶蛳山第四期文化层中并未发现有肢解葬，虽然可以解释为第四期和第三期之间存在缺环，或许延续着第三期的肢解葬在往后的发掘中还会在此遗址上陆续呈现，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肢解葬是出现于第三期的突发性事件变化。

究竟是什么事件或者一个共同的原因导致这些人被执行这种肢解葬？答案还是在这些肢解葬本身：被肢解的部位、方式、形态；死者的性别及年龄；他们死亡有无共同因素的关联；他们与同期的被执行其他葬俗的人的区别；稳定同位素分析人群迁徙的问题等等。所以，想要得到对顶蛳山遗址的肢解葬成因的彻底阐释，还有大量的基础工作要做，希望到时候有关顶蛳山遗址肢解葬的资料和解释能更为扎实而明确。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工作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南宁市博物馆：《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

址的发掘》，《考古》1998年第11期。

②国家文物局等编：《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会议手册，2011年4月。

③覃芳：《广西顶蛳山史前屈肢葬与肢解葬的考察》，《南方文物》2010年第2期。

④汪宁生：《云南考古》，第1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⑤覃芳：《邕宁县顶蛳山遗址葬俗试释》，《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

⑥⑬李珍：《邕宁顶蛳山贝丘遗址》，《中国文化遗产》2008年第5期。

⑧宋兆麟：《民族志中的割肢葬》，《中原文物》2003年第2期。

⑨潘世雄：《史籍中“宜弟”之说考释——兼释广西邕宁顶蛳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肢解葬》，《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

⑩高去寻：《黄河下游的屈肢葬——第二次发掘安阳大司空南地简报附论之一》，《中国考古学报》1947年第2期。

⑪郭京宁：《顶蛳山肢解葬成因初析》，《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3年第1期。

⑫吕鹏、傅宪国：《顶蛳山遗址出土蚌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南方文物》2010年第4期。

(责任编辑：赵 蕾)